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历史主义的兴起

[德国]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著 陆月宏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历史主义的兴起

[德国]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著 陆月宏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主义的兴起/(德)梅尼克著;陆月宏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0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ISBN 978-7-5447-0865-4

I. 历… II. ①梅… ②陆… III. 历史主义—研究 IV. K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6858号

书 名	历史主义的兴起
著 者	[德国]梅尼克
译 者	陆月宏
责任编辑	王 蕾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顾晓军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20.75
字 数	520千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865-4
定 价	4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编 序

这里收入的译著,大多来自“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出版计划,其中有的已经问世多年,有的则还没有来得及印行,现在都被统筹到了新的系列中。

于是又要为此写一篇新序。也好!趁着这个时机,我就来交代一下这套丛书的初始动机。已经事过差不多二十年,所以不妨更加坦诚地披露:自己对于这类著作的心灵饥渴,当年是在街头的人流中突然涌现的。仿佛遭遇了大地震一样,我冷不防近乎绝望地发现,周边再没有什么可以遮风挡雨的,而头脑中更是空空如也——以往读过的那些迂远的智慧书,如今信着全无是处!

这样一来,就势必要从头读起,否则就无力去因应深重的当代危机。正是在这种发奋的心境中,这套丛书既延展了八十年代,又突破了八十年代。无论要为此陷入多少繁琐的细节,我念兹在兹的都一直在于: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甚至对于中国问题的确认,都不能仅凭勇敢与冲动,还同样需要沉潜与周密。

为了咬定这个目标,我主动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如今看来也尤其适合我的道路。尽管身陷于官气十足的高等学府,不可能完全自外于

其名利规则,但更其吸引我的却是:由于更需要倚重读者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的出版企业,就总是要超前于它的教育事业。说到底,正是学术出版的民间品格,才是自己长期热衷此道的真实原因。

就这样,在长达十余年的坚持与苦熬中,心血一点一滴地淌下,终于汇成了如今这一汪活水。幸赖译林同仁的通力合作,这套书居然积成了现在的规模。不过,眼下还不到庆功的时候,反而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其实在编辑过程中,慰悦与追悔、惊喜与惊诧,至少是同样的多。无论在确定书目、购买版权方面,还是在申报选题、甄选译者方面,总会蹦出意想不到的困扰,让原有的设想不断地打折和受挫……

幸而,这些点点滴滴的心血,经年累月地流淌下来,还是在顽石上留下了刻痕。正如我的另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从坊间走进了北大的讲堂,开拓出了新的博士方向一样,我们这套主攻社会思想的丛书,也已开始成为北大同学的热门读本。在最好的情况下,总还是有可能不仅充当饭桌上的谈资,还会潜移默化他们的文化前理解。

正是在这个关口,我个人的兴奋点,就再次转回了研究室。毫无疑问,翻译工作对于现当代中国,具有别提多大的重要性。可话说回来,就算所有的翻译计划都得以实施,甚至所有的文句都没有翻错,中华民族也不能光靠这一点,就奢言什么文化上的崛起。若无力透纸背的批注,若无激烈抗辩的对话,若无充满想象的发挥,那么,这些历尽艰辛翻译出来的著作,终不过是些抛到水面的瓦片,刚刚溅起表浅的涟漪,就要沉入冰冷的一潭死水了。

要知道,我们这项卷帙浩繁的翻译工程,以及其他性质类似、规模较小的翻译工程,之所以能时时引起心灵的骚动,那无非是因为,当代中国的种种危机,有着无可回避的世界性背景——缘此,那些令我们深感困扰的中国问题,说穿了原本就是世界性的难题。

在这种情势下,也就理应心存这样的念想:一方面,如果自身并无

内在的智慧和思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资质和根底,去真正分享别人的智慧,而只会被这些天书把心智搅得更乱;另一方面,一旦真正读懂了、这些译著,则注定要发愿去激活这类智慧,并把自己的创造性运思,毫无愧色地回馈给整个世界。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长年合作者彭刚,感谢他为此承受的繁难,和为此贡献的耐力——尽管若非遇到这种场合,以我们之间的默契与认同,原不必把这种感激之情说出来,更不要说当着公众的面把它说出来!

刘 东

2008年3月29日于京北弘庐

译者的话

1862年10月30日,梅尼克诞生于普鲁士的萨尔茨维德尔(Salzwedel),其时,兰克学派和普鲁士学派正如日中天。梅尼克的父亲是邮局局长,是虔诚的路德派信徒,效忠于普鲁士王朝。在梅尼克的周围存在着正统的虔敬主义、忠于王权的保守主义与基督教—社会主义信念。1871年,因为父亲遭到贬职,全家迁往了柏林郊区。正是在柏林,梅尼克发现了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历史成为他以理想方式发现世界的途径。很快,在时代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正统的虔敬主义在梅尼克的心中衍化成了泛神论。青年梅尼克虽然丧失了对《圣经》中人格化上帝的信仰,不过却依然信仰在理念世界中彰显出来的神圣的世界背景,并由此走向中世纪的泛神论,走向诺斯替主义,最终充满喜悦地探询了它们与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1883年,梅尼克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日耳曼学、历史和哲学,受教于普鲁士学派三杰德罗伊森、西贝尔和特赖奇克,以及哈里·布雷斯劳。德罗伊森的“历史方法与历史百科全书”讲座,对梅尼克的个体观念和后来的思想史研究倾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梅尼克看来,在讲座中,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为科学事业投下了最后一抹温暖明亮的光辉。

西贝尔厌恶法国和奥地利,也厌恶天主教,认为它们是反民族的势力,是自由研究的敌人。他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以炽热的感激之心迎接1870年的德国统一。特赖奇克是普鲁士学派最年轻也是最伟大的成员,被称颂为“讲坛上的俾斯麦”,在他身上最充分地体现了历史与政治的融合。他认为社会的科学不存在,唯一存在的只能是国家的科学。德国的统一使他深信德意志前途无量,相信它的精神文明将使它成为各民族的老师。特赖奇克在早期论文中曾对战争大唱赞歌,认为消除战争的愿望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不道德。这种论调是与黑格尔一脉相承的。

1886年,梅尼克在赖因霍尔德·科泽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普鲁士十七世纪早期历史的博士论文,随后进入普鲁士档案馆工作。在西贝尔指导下,他着手撰写并完成了大学教授资格论文《陆军元帅赫尔曼·冯·博延传》。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十九世纪德意志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1893年,西贝尔推荐他担任《历史期刊》编辑。1896年,他继特赖奇克之后担任主编。此后直到1935年被纳粹政府解职,梅尼克一直主持《历史期刊》,对德国的历史主义和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正是在梅尼克撰写《博延传》和担任《历史期刊》编辑的过程中,德国史学界爆发了兰普雷茨辩论。兰普雷茨主要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德国史学界个体化的描述性方法,要求代之以阐明一般发展规律的发生学方法。他认为兰克的观念论业已过时,要求德国历史学家放弃神秘主义的历史实在论,转而从事历史发展的经验性研究。虽然梅尼克在这场辩论中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不过《历史期刊》却正是批判兰普雷茨的大本营。传统历史学家们主要征引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来批判兰普雷茨。辩论双方的一个基本分歧点是,历史学应该专注于社会史还是政治史。兰普雷茨辩论的积极影响在于,它反映

了历史学从对政治史的专注向着对文化因素的思考的转移。梅尼克也敏锐洞察到了兰普雷茨的贡献：对那些手艺人式的历史学家的狭隘和观念匮乏发出了警告，要求重新将观念和理论引入历史思想。梅尼克认识到，历史学必须恢复对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在的关切，必须恢复与哲学或哲学精神的交流。

梅尼克不是绝对效忠于普鲁士的顽固保守派人士，而是温和的保守派人士。他很早就对普鲁士精神有所质疑，甚至撰文批判威廉二世的社会政策改革。1901年，他获得了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席位，1906年，又转任为弗赖堡大学历史学教授。这两所大学都属于“上莱茵文化圈”，分别坐落于莱茵河的右岸和左岸，并都处于西南德意志文化圈之中。其时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正如日中天，马克斯·韦伯和特勒尔奇也正处于各自思想活跃的创造阶段。

梅尼克在这时期除了与上述诸人有密切交往之外，还结识了不少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瑙曼。正是在瑙曼等人的影响下，梅尼克开始致力于思考“德意志—普鲁士”问题，并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包括《德意志的崛起时代，1795—1815年》、《1914年德意志的崛起》、《十九、二十世纪的普鲁士与德意志》等。其中最声名遐迩的当属1908年出版的《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这时候的梅尼克尚未充分认识到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传统对德国前途潜在的巨大危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德国人几乎全体卷入了不可遏止的激情之中。诗人们纷纷颂扬战争，甚至高贵的神秘主义诗人里尔克也唱出了战争颂歌。教授们也踊跃表达了战争热情，在《德意志帝国高校教师声明》上署名的教授达三千多名。梅尼克与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卷入了战争的狂热之中。他在战争期间发表了大量政治性著述，清晰地表现出了思想的演变过程。一开始，梅尼克自信地认为，

德国民族观念的性质本身,使德国不会采取冷酷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在德国,权力和精神、国家和文化是交织在一起的。1915年时,他还不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欧洲文化衰落的开端。到了次年,他首度承认,德国民族文化或许比西方功利主义更倾向于滥用精神价值而为权力效劳。1917年,当德国败局已定时,他悲哀地意识到,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人类的一种悲惨处境。就这样,战争粉碎了梅尼克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中所表达的客观唯心主义,粉碎了他对精神与权力、非理性与理性之间和睦相处的乐观假定。

魏玛时代是一个充满幻灭、失望和矛盾的动荡时代。对梅尼克来说,战后的幻灭感集中表现在1924年出版的《国家理性观念》之中。这本著作研究的对象是国家问题,是权势政治,亦即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梅尼克在撰写这本著作时,还有一个未曾言明的动机,即向全世界表明,德国不是现代史上贯彻权势政治的唯一国家。梅尼克认为,国家理性原则的一般实践,尤其是权势政治的目的,是介于因果关系与价值、自然与精神、实然与应然之间的中间领域的典型现象。他有时把国家称为两栖动物,其中混合了崇高因素与卑鄙因素^①。他甚至说,国家受到生存斗争的自然法则的支配,在国家理性的实践后面隐藏着自我保存的追求。他也确实认为国家理性的实践具有道德的层面。他还认为国家理性是国家从自然向精神发展的命脉,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孕育于因果关系并从中破土而出、指向价值天堂和自由王国的崇高现象。他在这本著作的结尾对国务活动家发出的呼吁是:在心中既想着国家,也想着上帝。梅尼克对历史主义也有所反思。他认为,国家理性的力量已经获得近代经验上的承认,并且获得历史主义的首肯。但是,由于导致了与西方各民族持有的自然法观念的决裂,导致

^① 参见梅尼克,《马基雅维利主义》,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0页。

了德意志的思想孤立,因此历史主义有责任进行深刻的反省。在指出自然法观念的深刻缺陷时,他也指出了德意志历史思想的缺陷,那就是它倾向于声称权势政治合乎一种崇高道德,谅解权势政治并将其理想化,从而在实践中有可能纵容一种粗野的自然主义和生物式的暴力伦理。

梅尼克在1936年出版了《历史主义的兴起》。二战后的1946年,他撰写了《德国的浩劫》,这本著作从长达两个世纪的德国历史文化背景入手,阐述了导致纳粹专政的原因,简要评论了自歌德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直至纳粹覆亡的德国思想文化,他在谴责纳粹的同时,竭尽全力为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化进行辩护。

在1936年出版的《历史主义的兴起》中,梅尼克声称,历史主义的兴起乃是西方思想中所发生过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历史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而且是一种生命观和世界观。这种生命观是经由从莱布尼茨到歌德为止的德国运动获得的。历史主义的实质是一种个体化的观察,而个体的本质在于,它只有通过一种发展的过程才能显示出来。

这本著作分为两部分。首先讲到的是先驱者们:沙夫茨伯里、莱布尼茨、阿诺尔德、维科及拉菲陶。历史主义的产生过程充满了与自然法观念艰苦卓绝的搏斗。历史主义的萌芽有赖于打破僵硬的自然法观念及其对至高人类理念和人性齐一性的信念,并将生命的流动性注入其间。在这个萌芽阶段,这些先驱者们做出了重大贡献。沙夫茨伯里原初的、深邃的普世基督教与新柏拉图主义,及其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宇宙构想密切相关的审美才能,开启了历史观照的新的可能性。莱布尼茨是一位对德国运动有着持久影响的思想巨人,在他的单子学说和“前定和谐”体系中也渗透着新柏拉图主义世界观。莱布尼茨是

以发展观念为代价而对个体观念进行提升的。他为历史知识赋予的目的是功利主义和道德的,同后来的伏尔泰一样,他也是文明史研究的先驱者。阿诺尔德的唯心主义软化了奠基于自然法之上的思想,使经由神启示出来的灵魂的绝对价值成为世界历史的奠基石,他是第一位将人类灵魂摆放在历史舞台中心的历史学家。意大利的维科也是广义上的柏拉图主义者,他的关于民族历史无所不包的叙述、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不同阶段的研究方式、对历史事件根基的探索,都深深影响了现代历史思想。他虽然强调了种类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却没有强调个体的发展。维科仅仅是在允许种类发展的程度上,才是历史主义的先驱。

启蒙运动在历史领域中的巅峰成就表现在伏尔泰的作品中。伏尔泰的历史观念受到了三种特殊倾向的规定:满意于当下生活的新感受、自然科学和数学发现带来的强烈印象与道德主义的倾向。伏尔泰对历史思想的贡献就在于,使西方人确信每一个伟大的新观念都必须奠定在历史的基础之上,从而将互为对手的新观念和老观念都放到了历史的天平之上。他具有对所有与历史相关的事物的好奇心。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走到了历史主义的门槛上。

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持有慷慨激昂的道德主义,批判马基雅维利和近代政治人物的思想世界和政治活动领域;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对因果性思想的迫切渴求。他最伟大的成就在于,为政治人物提供关于国家生活最彻底的知识及奠基于其上的治国格言。孟德斯鸠的思想统一了自然法—理性思潮与经验—现实思潮。他的历史解释的一个特点是,将个人的实用主义和制度的实用主义以及所有其他的超个人原因结合起来。孟德斯鸠的历史观念仍然深受机械式因果论和历史循环理论的影响,不过它也许代表了这个阶段的启蒙运动所获得的最高程度的历史意识。孟德斯鸠的政

治相对主义对未来的历史主义而言是一块里程碑,他使人们产生了对历史造物新的尊敬,对迄今未曾注意到的事件的意义和结构做出了新的发现。

休谟把整个生命和世界历史转变成了无数受普遍法则支配的心理情结。因此,他被称为现代实证主义之父。他的随笔和《英国史》充满了丰富的具体经验,渗透了个体的独特感受。他的宗教史研究打击了古典世界对人类理性的信念,认为人类是从低级阶段通过缓慢的发展上升到高级阶段的。但是,休谟不能以任何的彻底性贯彻发展观念。因为在他身上还存在着循环理论这样的自然法观念的残留物。休谟关于国家起源的自然主义学说打击了社会契约论。可以说,他在不具有个体观念和个体的发展观念的情形之下,就拥有了新的历史意识。休谟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出人性能够实现多大程度的完美状态。他的缺陷在于对历史运动背景理解的不充分和对导致历史变迁的隐藏倾向的感受的缺乏。作为道德主义者,休谟认为政治计谋压倒真理、法律和习俗是人类不幸的最大源头之一;但是作为经验主义者,他把这种历史现象看作长期存在和世界性的邪恶,他理解它的流行和力量。与伏尔泰一样,休谟认识到历史中能产生结果的主要因素就是国家和宗教。不过由于机械心理学的限制,他没有能够把这两种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也缺乏将它们与整体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最重要的是,休谟未能为历史生命提供内在的灵魂。

《罗马帝国兴衰史》的作者吉本,为历史主义传递了两项遗产,并直接在兰克那里获得了最高的发展。一是吉本对材料世界历史式的把握,他的深入材料和将不同部分结合起来的能力。二是民族共同体即西方基督教民族的观念,它将启蒙运动与历史主义联系了起来。吉本欢迎这个民族共同体繁复的多样性,也欢迎它的共同性格。在罗宾逊的历史著作中贯穿着普遍历史的线索,表现出了对处于运动之中的

世界现象的高度尊重,对世界特殊的和个体的性质的高度尊重。

有两位思想家对休谟所获得的进展和英国前浪漫派所获得的进展进行了综合,他们就是弗格森和柏克。弗格森致力于既经验主义又创造性地将人类社会形式的发展从原始水平追踪到高度文明的水平。他强调社会成长中本能的力量,认为社会制度起源于自然的冲动,认为原始种族的语言证实了人类天生就是诗人。他全面肯定了古代因素对现代文化历史及其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中世纪生活和习俗的重要性。弗格森意识到了人类精神在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中是决定性的因素。他赋予了国家和维持它的内在力量以恰当的重要性。柏克把前浪漫派以更为个体化的方式理解艺术和历史的新原理应用于国家。在柏克眼中,国家呈现出了美好和仁慈的一面。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于对法国的憎恨,他把英国虔诚化和勇武化了。在柏克所有的价值、政治和历史判断中,存在着一种世界性虔诚,这种世界性虔诚代表了未来历史主义所需要的重要态度。沙夫茨伯里已经抱有这种虔诚,而歌德对它进行了最深刻和最丰富饱满的表达,兰克则把它最普遍地应用于历史世界。柏克的世界性虔诚通过使历史中更高的力量领先于人的理性意志,而消除了自然法观念的根基。但是,柏克的思想还不是历史主义,而是一种复活了的传统主义,是对于启蒙运动的强烈抗议,代表了传统方法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国家内在的生命力,是柏克对新历史观所做出的最伟大贡献。

历史主义运动在较晚的时候来到德国,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臻于成熟。在启蒙运动历史学家的激励之下,与英国历史学家的世界历史联结在一起,德国思想转向了普遍性领域,开始拥抱整个人类。德国运动中的伟大人物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莱辛、温克尔曼、席勒和康德,是较为理念化的,他们由于提高了德国精神生活的水平而为

历史主义做出了准备性贡献；第二类包括默泽尔、赫尔德和歌德，是较为个体化的，他们是历史主义较早形式的直接鼓动者。

莱辛关于生命和历史中最高价值的思想，都受制于他对人性中的基本伦理动机的探索。在他的思想中，上帝在世界中，并且伴随着世界而发展。正是发展观念使他与斯宾诺莎区别了开来。不过，莱辛的发展观念不是历史主义的，而是莱布尼茨的规范观念和启蒙运动的完美主义观念的结合。温克尔曼在历史主义的前史中是一块里程碑，他最重要的成就是他对艺术创造物的历史世界的全身心投入。但是，在艺术史研究中，温克尔曼按照基督教的绝对价值来衡量所有事件，认为唯有希腊艺术达到了艺术美的顶峰。因此，他的发展观念也束缚于完美观念。温克尔曼预感到了对于历史创造物的精神移情。他的正统的古典主义追随柏拉图的理念，教导人们要超出个体领域而进入纯粹的理念气息之中。德国运动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正在于，观察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生命态度产生的理想化和人格化影响是如何肩并肩地作用的。直到歌德那里，这两种影响才交融在一起。

默泽尔历史意识的基础是他对家乡历史和古文物的热爱。默泽尔是通过与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接触，才从对古文物的热爱中找到通向历史主义的道路的。他的总体印象学说可以被称为进入历史主义大门的钥匙。这种学说认为，整体是公正美好的，而织成它的个别线条却可能是极其丑陋的。它的结论是应该遵从整体，并陶醉于其中。默泽尔的另一种认识方法是全神贯注地深入到主题之中进行体验，以便接近对象，亦即“切入”事物，集中力量研究个别的微小细节，吸收原原本本的历史现象，运用类比以直觉地引起一种对普遍现象的洞察。他在撰写《奥斯纳布吕克史》时，把整个德国民族放在了心中，从而实际上描述了一个民族完整的政治发展。在这里出现了对于个体的新意识。默泽尔认为，国家也应该按照特殊的个体性法则生活，从而提出